

学习参考资料

试论幽默的情境和功能

陈孝英

度过了为时十年的大地凝寒，幽默这支兰花又以绰约新姿摇曳于中国艺苑的春风之中。相声和漫画以轻骑兵的姿态打响了第一枪。喜剧不甘落后，跃跃欲试地登上舞台和银幕。专登或兼登幽默作品的报刊相继问世。就喜剧、讽刺、幽默等专题开展的讨论正在深入。越来越多的文学家、艺术家开始重视运用幽默的手法来结构作品，刻划人物，创造气氛。幽默又重新萌发了青春，决心发挥别的艺术品种难以替代的作用，为向四化进军的中国人民提供一份素雅精巧的精神食粮。“幽默”是一个属于美学喜剧范畴的概念。对于这一概念的内涵和外延，长期以来国内外美学专家众说纷云，莫衷一是。总的来讲，有广义和狭义两种理解。

广义的幽默是喜剧艺术（或称“笑的艺术”）的一个总称，它包括一切使人发笑的文字及其他艺术形式（如绘画、音乐等）在内，讽刺、滑稽、戏谑、闹剧、打诨……都是“广义的幽默”大家族中的合法成员。欧美国家的许多所谓“幽默杂志”，一般都是用其广义；国内外有些“幽默选”，也是包括一切使人发笑的故事在内的。

狭义的幽默仅仅是喜剧艺术中的一个分支，是“笑”所包含的众多艺术形式中比较含蓄、深沉的一种。它往往运用借喻、双关、反语等暗示的手法，机智、含蓄、轻松的语言，借助于联想，造成一种充满情境、引人发笑而又耐人寻味的艺术情境，来肯定美、真理和智慧，否定丑恶、谬误和愚蠢。本文想就幽默艺术（即这种狭义的幽默）的某些规律作一点尝试性的探讨，意在引起对它的重视和进一步讨论。

创造幽默情境的基本环节

幽默最重要的特点之一，在于能够造成一种情趣色彩浓厚、令人回味无穷的艺术情境。那么，一则典型的幽默，在通往这种情境的道路上，一般都要经过哪些步骤呢？这里，试将幽默情境的形成过程划分成制造悬念，着意渲染；出现反转；产生突变四个相

对独立的环节进行探讨。

下面，以马克·吐温的一则幽默轶事为例，看一看这几个环节的具体形成过程。

一次，有人问马克·吐温：“演讲词是长篇大论好呢，还是短小精悍好？”他没有从正面作答，而是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有个礼拜天，我到礼拜堂去，适逢一位传教士在那里用令人哀怜的语言讲述非洲传教士的苦难生活。当他说了五分钟后，我马上决定对这件有意义的事情捐助五十元；当他接着讲了十分钟后，我就决定把捐助的数目减至二十五元；当他继续滔滔不绝地讲了半小时之后，我又在心里减到五元；最后，当他又讲了一小时，拿起钵子向听众哀求捐助并从我面前走过的时候，我却反而从钵子里偷走了两块钱。”

马克·吐温对别人提出的问题没有直接作答，却不慌不忙地讲起一个毫不相干的故事来。这时，读者十分关心作家对这个问题到底持什么看法，讲这一故事又是什么用意。由这种关心产生了紧张、好奇、急于了解下文的心理。这就是“悬念”。

在捐钱的故事中，随着教士讲演时间从五分钟增至十分钟和半小时，马克·吐温决定捐助的数目则从五十元减到二十五元和五元。这就进一步加强了“悬念”造成的气氛，为后面的“反转”作了层层铺垫烘托。这就是“渲染”。

情节进一步向前发展，当演讲时间增至一小时，作家的态度则从原来决定解囊捐助一变而为反而偷“走了两块钱”。如果说，对于从捐助五十元减至二十五元乃至五元这一量变过程，读者还可能有什么思想准备的话，那么，从捐钱到偷钱这一质变过程则完全是在读者的意料之外了。这一神来之笔就象是一个突破口，把作家前面几次减少捐钱数目的念头都一一串连起来，并通过联想这一媒介物，将捐钱和演讲这两件似乎是毫不相干的事情联系在一起，使人大梦初醒，幡然悟及马克·吐温藏在捐钱故事背后的潜台词：演讲的效果同演讲词的长短往往成反比。这就是“反转”。

当人们一旦发现了作家的寓意，“突变”便同时出现，情况迅速起了变化：原来觉得捐钱故事跟别人提出的那个有关演讲词的问题风马牛不相及，现在看来这正是幽默大师巧用借喻、巧设悬念、巧作回答的高明之处。于是，悬念得以解除，读者发出了满意的、会心的微笑。这就是“突变”。

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

所谓“悬念”，就是通过某些情节的叙述、描写和交代，使人们对描述对象产生关心，对下文产生好奇，从而打破原有的平衡状态，造成一种紧张的心理状态。制造“悬念”通常采用巧设伏笔、假述表象、声东击西的手法。目的在于提出疑问，布下迷阵，造成假象。

所谓“渲染”，就是对已造成的“悬念”、假象作多方铺陈、描写、形容和烘托。

“渲染”通常采用白描、夸张、歪曲等手法。目的是承上启下，发展加强和“悬念”造成的气氛，为引起“反转”打好基础。

所谓“反转”，就是在着意渲染的基础上，笔锋一转，突然出现某种出人意外的下文或合理新奇的事物，打断了人们的正常设想或合理，预想使人经过一番思考，对描述对象的真相或规律实现从一种认识到另一种新认识的转变过程。“联想”是这一认识转变过程的媒介物，以往的社会实践和切身感受是联想赖以产生的基础。引起发现的手段

主要是妙语，常用的有借喻、双关（谐音的和语义的）反语等修辞格。“反转”的目的在于戳破假象，解除“悬念”，启动联想，产生“突变”。

所谓“突变”，是指“反转”出现后的效果：“悬念”得以解除，好奇得到满足，紧张化为和缓，局势迅速向反面转化。“突变”和前三个步骤不同，它并不以文字或其他任何书面形式（如画画）出现，而仅仅存在于艺术家和观赏者的意识之中。

幽默的整个形成过程，就是首先制造“悬念”，唤起人们积极主动的形象思维和逻辑思维；进而层层“渲染”，步步近逼；然后笔锋一转，引起“反转”；再由“反转”在观赏者的意识中产生“突变”，至此幽默情境遂告形成。

在创造幽默情境的过程中，有一些带普遍性的规律值得注意。

第一，创造幽默情境，既要注意环节的完整性，又要允许一定的灵活性。

幽默的四个环节，在表述过程中以文字或其他书面形式出现的只有前三个，即悬念、渲染和反转。这三个环节相当于一个故事的开头、中间和结尾，或戏剧冲突的发生、发展和结局。一般来说，只有具体地、生动地表现了幽默冲突的这种完整过程，才能真正充分地达到幽默艺术的美学效果。可以作一个对比，前面我们引用了马克·吐温的幽默故事，有趣的是，我国古代思想家墨子也曾举过类似的例子：

一次，墨子的学生子禽问他：“老师，话说得多了好不好？”墨子同样没有直接回答，而是举了一个饶有风趣的例子：“池塘里的青蛙日夜不息地鸣叫，但有谁去理睬它呢？而雄鸡天亮时只叫了第一声，就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马克·吐温和墨子分别用听教士演讲和青蛙、雄鸡鸣叫作比，来说明演讲、说话的效果和长短之间的辩证关系，有异曲同工之妙。从哲理的角度来看，二者各有千秋；但从幽默艺术的美学效果来看，前者由于比较具体、生动而有层次地表现了幽默冲突的完整过程，因而比起缺乏具体渲染过程的后者来说，就要更为生动，造成的幽默情境也更故烈。

但这又不是绝对的。由于艺术具有典型概括的作用，艺术家既可以用浓墨重笔对幽默大事渲染，也可以在某些特殊的艺术形式中或在某种特定的情况下，对幽默进行浓缩和概括，仅仅用最富有特征的一个细节、一句反话、一个比喻，甚至只是一幅肖象的素描，就把幽默的矛盾冲突表现出来，让艺术的观赏者依据这种概括化和典型化的结晶去进行想象和联想。正因为艺术欣赏具有这种特点，所以，某些诗歌中包含着幽默感的诗句，某些小说、戏剧、杂文中带有幽默情趣的简短描写、叙述或对答，以及某些特殊的艺术形式（如歇后语、警句、漫画等），其中幽默的几个环节往往并不完整，有时会出现某些环节彼此交叉、省略某个环节以至三个环节合而为一等种种现象。如中国的歇后语和欧美国家的“幽默警句”便是常见的两种形式。

歇后语是汉语独有的语言现象，是中国人民表达幽默感的一种特殊方式。它依靠谐音双关和语义双关，造成巧妙的幽默情境。谐音的如：

孔夫子的褙褙——书呆（袋）子

膝盖上钉掌——离题（蹄）太远

语义的如：

坐飞机掷象片——丢人不知高低

擗面杖吹火——一窍不通

看了歇后语的前半句，人们不禁要问：“此话怎讲？”这或许可看作是“悬念”；紧接着，后半句一语道破，使读者恍然大悟：“原来如此！”这或许可认为是“反转”吧？

“幽默警句”是欧美人民喜闻乐用的一种幽默形式。它哲理味浓，高度浓缩，往往筛除一切铺陈、烘托和渲染的成分，只留下一言半语的“悬念”和画龙点睛的“反转”，有时干脆就是一句话或一句反话。例如：

文盲也有个好处（悬念），他不会写匿名信（反转）。

戒烟是不难的（悬念），我已经戒过一百次了（反转）。

幽默环节不完整表现得最典型的，莫过于单幅的幽默画了。它将幽默的几个环节全部溶于一幅画面之中，让艺术的观赏者依靠联想在自己的思维过程中去走完创造幽默情境的全过程。

因此，我们说“幽默要注意环节的完整性”，就是那些带有情节的艺术形式而言的，而且其含义是说幽默冲突必须有一个发展的过程。不能把这种环节的完整性同一定程度上的灵活性对立起来。

第二，创造幽默情境，要使矛盾冲突既处在“意料之外”，又尽在“情理之中”。

任何一则幽默，都包含着两种逻辑，一种是观赏者根据常理推演的逻辑，另一种是幽默规定的情节和人物的特定逻辑。构成幽默的矛盾冲突的基础，便是观赏者的逻辑同幽默的逻辑二者之间的对立。幽默艺术家一方面通过“渲染”，微露端倪，故设圈套，使观赏者按照自己的逻辑（实际上是按照艺术家“欲擒故纵”之需要）推演出某种结果来；另一方面，“反转”一经产生，谜底一经揭晓，又赫然出现一个与观赏者逻辑推演的结果不同甚至相反的结果来。于是，观赏者便感到大出“意料之外”。由此可见，

“反转”其实就是将观赏者的逻辑扭向幽默的逻辑的一个扳手。所谓“反转”，如前所述，就是在着力渲染的基础上，笔锋一转，突然出现某种出人意外的下文或十分新奇的事物，打断了人们的正常设想或合理预想，使人对描述对象实现一个认识上的飞跃。因此，要产生“反转”，造成幽默情境，就必须使幽默的逻辑同观赏者的逻辑之间的对立不同凡响，不落俗套。也就是说，要使幽默的矛盾冲突的具体过程具有观赏者无法设想的新奇性和独创性，产生一种“绝处逢生”甚至“起死回生”之感。只有矛盾冲突具备了独特的个性，使人感到新奇，才能出人“意料之外”，勾起观赏者会心的笑声，追求矛盾冲突的新奇性和独创性，对于创造幽默情境来说，既是最低的要求，又是最高的境界。古往今来的幽默大师，为刻意追求这种无止境的理想境界，不知染白了多少根黑发，拈断了多少根茎须！

“意料之外”能造成情节的惊险，引起观赏者的惊奇，但是，“惊险”和“惊奇”不应变成故作“惊人”之笔，以至荒诞不经，使人难于置信。为此，就需要使观赏者于惊险和惊奇之余，从“意料之外”转化为“情理之中”。实现这一转化的基础就是“情理”。所谓“情理”，就是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如果幽默的奇特情节是建立在这种一般规律之上的，也就是说，幽默艺术家是以新奇、独创的艺术构思揭示事物的普遍规律，那么，幽默的矛盾冲突就可以做到奇而不诞，险而有理。所以，“意料之外”和“情理之中”的关系，就是幽默的巧妙构思和事物的一般规律的统一，矛盾冲突的新

奇性、独创性和情理的主观性的统一。只有把这二者统一起来，才能使观赏者笑得酣畅，笑得踏实，笑得舒服。

丁西林写于1925年的喜剧《压迫》，是处理这种关系的一个范例：

房东太太不愿把三间空房租给一个没有家眷的男房客（工程师），但当男房客来租房子时，房东不在，她女儿收下了定钱。房东回来得知后，坚决要退定钱，并派人去叫巡警来撵房客。这时，适逢一位女职员也来租房。男房客同情她到处租不到房子的苦处，便想出一个办法：等巡警来时，“我把巡警痛打一顿，让他把我带到巡警局去，叫房东把房子租给你，这样一来，我们两个人都有了住宿的地方，”女房客不同意，她想出一个更妙的办法：“让我来作你的太太，好不好？”于是，巡警来后，男女房客假称夫妻，房东只好服输，让他俩各住一间房子。

为了有房子住，一个工程师竟打算自投牢狱，一个年轻姑娘居然自荐做陌生人的假妻子，其主意之新奇，性格之大胆，确为常人所难以料就。但这一对青年男女是经过“五四”新思想洗礼的知识分子，具有这种性格，想出这类主意，又是有着充分依据的。如果把他俩生活的时代朝前推上二百年，在那种“男女授受不亲”的封建时代，让一位大家闺秀为住房问题去向一个公子哥儿自荐假结发，恐怕就很难说是在“情理之中”了吧？

在这里，我们遇到了幽默特有的一个住有趣味的问题：有些幽默，在“渲染”或“反转”的过程中，住用了“歪曲”、“诡辩”和“反语”等手法，而“歪曲”、“诡辩”和“反语”本身就是不合逻辑、不合情理的，那么，这一类幽默又怎么能做到“意料之外”和“情理之中”的统一呢？为说明这一问题，我们先解剖《史记·滑稽列传》中记载的两则用反语造成的幽默轶事。

秦始皇嬴政统一六国后，踌躇满志，准备扩大苑囿，“东至函谷关，西至雍陈仓”。宫廷演员优旃得知后，便进谏道：“那好，多放些禽兽在里面，如果敌人从东边打过来，只要放出麋鹿用角抵住他们就行了！”始皇听后，便打消了这个念头。

秦二世胡亥上台后，又打算给咸阳城漆上油漆。优旃又进谏道：“好啊！主上不说，臣我还要请求哩。漆城虽然对于百姓是个负担，可那该多漂亮呀！城漆得又光又滑，敌人来了不能上。此事可以马上就干。可是，漆要荫干，从哪里弄那么大的荫棚呢？”胡亥听后不禁笑起来，此事也就作罢。

这种用反语造成的幽默，从表面看似乎是荒诞不经的。优旃谏秦皇，竟然连麋鹿和油漆都有了御敌之功用，岂不荒唐？但须知，“反语”正是通过荒谬悖理、自相矛盾、滑稽可笑的假象告诉人们隐藏在反面的某种真意的。反语说出口的全是反话，但与此同时，又必须使谈话对方或观赏者听得出那恰恰相反的弦外之音。为此，它往往有意把某种需要否定的观点无限延伸，甚至夸大（有时还不惜歪曲）到漫画化的程度，使之变得矛盾百出，荒诞离奇，让人们自己得出必须否定它的结论。这是一种“欲擒故纵”、“以退为进”的手法。这“擒”和“进”的过程，也就是实现反转、产生突变的过程。

当我们看这种用反语（以及歪曲、诡辩）构成的幽默时，就好象看一面哈哈镜。镜子里的形象千奇百怪，有时甚至完全走了形，但它终究还是某种实体在特定条件下的反映，因此仍不失其真实性，仍有它存在的基础和理由。其妙处正在于那“不似真实，又胜似真实”之中。

第三，创造幽默情境，既要着意渲染，又要不动声色。

如果说，好的“反转”应使幽默的矛盾冲突具有扣人心弦的新奇性和独创性，那么，好的“渲染”则应使幽默的矛盾冲突具有激动人心的尖锐性和生动性。正因为如此，出色的幽默作品总是在“渲染”这一环节，运用白描、夸张、歪曲等手法，围绕前面的“悬念”和后面的“反转”，努力把戏做足。这就要求幽默作品既要防止“水过地皮湿”，渲染不够就草草收场，又要紧扣主题，切忌任何与引起“反转”无关的废话。

在这方面，我国相声艺术的经验尤其丰富。比如，脍炙人口的《帽子工厂》的垫话，一开始就开门见山，制造出“一家工厂的帽子为什么卖不出去”这样一个悬念，然后，紧紧围绕“帽子”这个题目，用那帽子“可大”、“分量重”、“戴上受不了”、“戴上可就摘不下来了”这样四层意思反复加以渲染，使悬念越来越扣人心弦，及至最后利用“帽子”一词多义的特点，运用语义双关的手法向观众亮出谜底：原来这里说的并非御寒的普通帽子，而是四人帮“帽子工厂”特制的“反革命帽子”，于是幽默感顿时化作会心的哄笑。这就是紧扣悬念和反转层层渲染的一个范例。

前面说过，渲染的目的，从“承上”来讲，是为了加强悬念造成的气氛；从“启下”来说，是为引起反转作铺垫。对此，幽默艺术家自己一定要心中有数，要象磁针指向磁极那样，始终围绕这个中心目的来组织材料，进行渲染。但是，在读者和观众面前，幽默艺术家又要做到不动声色。要胸有成竹地一层层解开包袱，一步步把观赏者领到终点，打算让他们在哪儿发笑，他们就非得在哪儿发笑，既不能迟，也不能早。为此，就必须在众目睽睽之下瞒过无数只聚精会神的眼睛和耳朵，神不知鬼不觉地埋下引起反转的伏笔、解开悬念的钥匙。这说明，艺术价值高的讽刺性作品，都善于幽默情境的创造。

幽默的社会职能和艺术功能

唯物主义美学指出，一切喜剧性的源泉都是客观现实生活的矛盾。

幽默，作为美学范畴中一种重要的艺术表现形式，必然也是真实地反映社会矛盾的结果。长期以来，对于幽默和客观现实生活之间的关系，对于幽默的社会职能，存在着两种截然相反的看法。

一种认为，幽默是纯娱乐性的东西。这种观点在我国的代表人物，当推林语堂和胡适。林语堂把幽默看作是一种“为玩笑而玩笑”的东西，是“闲适”或“在俏皮与正经之间”的玩意儿。胡适则把幽默仅仅归结为“使人开口一笑”。有些人不同意这种看法，但他们在批判“纯娱乐”论的同时，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以至认为幽默只有成为否定有害现象的武器时，才有生存的价值。有的虽提出，幽默除可表达“对生活中的缺点及反面现象的否定”外，还可表达“对优点及正面现象的肯定”，但不承认还存在着一一种既非否定又非肯定的幽默。

我认为，就社会职能而言，幽默可分为三类：

第一类，通过对生活中的缺点和反面现象的否定，表明一定的是非观念。“四五”运动中的幽默诗词对“四人帮”的笑谑，鲁迅、老舍对阿Q、孔乙己、祥子（《骆驼祥子》主人公）的嘲弄即属此类。

第二类，虽然也包括有是非观念，但仅仅表现为对生活中的优点和正面现象的肯定，而不直接否定缺点和反面现象。在赞美喜剧《今天我休息》和《五朵金花》的戏剧冲突中，在幽默喜剧《李双双》和讽刺喜剧《西望长安》的正面人物身上，都可以发现这类幽默。

上述两类幽默，虽不象讽刺那样火辣辣地鞭答某种丑恶事物，也不象颂诗或悲剧那样直接地、放声地讴歌某种美好事物，但它仍然含蓄地表明一定的是非观念，以其别具一格的方式发挥着文艺的认识作用和教育作用。它犹如一包漂白粉，扬弃生活的杂质，洗涤人类的灵魂；又象一丛疾藜，卫护着真理和善良，抵御着野兽和小偷；也象一股清泉，洗亮观赏者的眼睛，浇灌新道德的幼苗。使人透过会意的、轻松的微笑领略某种道理，明辨某种是非，受到某种教育。

此外还有一类幽默。它并不包含明显的是非观念和褒贬色彩，既不包含对反面现象的否定，也不包含对正面现象的肯定。而只是对日常生活中的某些现象进行饶有情趣的、甚至是违背常理的反映，使人从中得到一种智慧和美的享受。有人把这类作品叫做“纯幽默”。这种幽默能够陶冶人的情操，调节人的精神生活，培养健康的审美观，为生命增添新的活力。外国不少儿童幽默、中国相声“垫话”中的包袱以及中外许多幽默漫画多属此类。1979年8月4日《文汇报》刊登的幽默漫画《吹泡泡》，就是对吹泡泡这种生活现象作了生动、夸张的描绘。当人们看到泡泡越吹越大，肚皮越来越瘪的有趣对比时，不禁大笑起来。可是，有些读者不理解这类幽默的特点和功能，硬要从中找出针砭的对象，甚至向编辑部写信询问这幅漫画到底是影射什么的。为此，编者发表专文阐述幽默漫画的特点，着重介绍了这类不包含褒贬色彩和是非观念的幽默。

幽默是生活的一部份，从古代到现代的各种文字体裁中，几乎都可以见到幽默的踪迹。文学艺术中的幽默，作为内容，不仅具有社会功能，而且在创作上具有艺术功能。具体来说有三：一是结构作品，二是刻划人物，三是烘托气氛。

所谓用幽默结构作品，是指借助于巧妙安排的人物关系，通过饶有风趣的情节，造成一种耐人寻味的幽默情境。莎士比亚的名剧《威尼斯商人》便是典型的一例。

商人安东尼奥为帮助友人巴萨尼奥向当地一富家女儿鲍西娅求婚，去找犹太富商夏洛克借钱。夏洛克想乘机报往日的私仇，使假意不收利息，“开玩笑”似地要求：如借款逾期不还，就要从安东尼奥身上割下一磅肉作为偿金。安东尼奥的货船到期未归，无法还债，夏洛克便要求依约割肉。鲍西娅女扮男装，假扮律师出庭辩护，指出夏洛克可以从安东尼奥身上割一磅肉，但必须严格执行契约，既不许多割也不许少割，既不能流血也不能致死。结果，夏洛克败诉。

这出喜剧的整个矛盾冲突，从头至尾都是建立在“夏洛克的一磅肉”这一充满幽默情趣的情节之上的。

幽默的主要艺术功能是为了刻划人物。幽默经常被用来塑造带有某种非根本性缺点的喜剧形象。这类人物的幽默基础，是建立在他们自身某种需要克服的缺点和周围现实的矛盾之上的。如：孙喜旺的保守、落后思想必然和李双双的好胜、泼辣性格形成先进与落后的矛盾，喜旺对双双的暗暗佩服和他的大男子主义又势必形成言与行的脱节；我国古代寓言《郑人买履》和《揠苗助长》则反映了形式与内容、动机与效果的矛盾。这

些矛盾便是提炼幽默因素、塑造这类有缺点的喜剧形象的基础。

在某些场合下，即当幽默被作为手段用来讽刺的目的服务时，幽默也可以刻划反面喜剧形象的奸诈、狡黠、贪婪、伪善、附庸风雅等性格特征。《钦差大臣》中假钦差与市长初次会面时互相欺骗、互相捉弄、互相揭露的场面，便是例证。

幽默也往往用来塑造正面的喜剧形象。正面喜剧形象是赞美喜剧的主人公，在幽默喜剧和讽刺喜剧中也占有重要的地位。这类形象的正面性质决定了，要使之成为名副其实的喜剧形象，无法仰仗于讽刺，只能求助于幽默。在我国喜剧史上，相比而言，正面喜剧形象是一个薄弱环节。在不少喜剧中，正面形象或苍白干瘪，或一本正经，或不伦不类，与整个喜剧的风格很不协调。因此，如何塑造好喜剧中的正面形象，已成为提高喜剧水平迫切需要解决的一个难题。一般说，应从人物特定的性格出发，挖掘、提炼他身上的某种特性同周围现实之间的矛盾，来构成富有情趣的幽默情节，刻画性格。例如，经常用来表现先进人物公而忘私的题材——入迷，就是利用这些人物全神贯注于某项工作、某项发明，以至到了痴迷的程度，来设计出种种可笑的情节，造成情趣很浓的幽默情境。幽默喜剧《又一春》里的方明误吃了安眠药，在半睡眠状态中强令自己继续奔波；幽默喜剧《约会》中的刘明问谈一次恋爱“应该用多少时间”，因为他“每天都规定好了，一天至少要工作十四小时”，计算谈一次恋爱得花多少时间，是为了“晚上回到所里好补回来”。这些幽默感很强的细节作为一种补充色调，活现了这两位先进人物埋头事业、专注入迷的可爱性格。

有时，幽默艺术家还从正面喜剧形象的性格出发，让人物说出一种不言而喻的“大实话”，来表现人物的憨厚、天真或刚直不阿，造成幽默效果。在这方面，戏曲片《七品芝麻官》和《屠夫状元》作了比较系统、比较大胆的探索。在中国的传统戏剧里，丑角总是被讽刺、嘲弄的对象，而在这两出戏中，鼻子上涂着一块白颜色的丑角——芝麻官唐成和屠夫胡山竟破例登上了“第一号”正面人物的宝座。编导突出这两位正面喜剧形象的手法，除了不拘一格的步履、动作（如唐成倒骑毛驴）之外，往往让他们或貌似正经、或万般无奈地道出一连串大实话。这种大实话活画出“芝麻官”和屠夫那种中国农民式的憨厚、幽默的性格，使人对这两位秉直不阿的丑角油然而生敬意和好感。影片《七品芝麻官》和《屠夫状元》的这一尝试，为用幽默手法塑造正面喜剧形象开拓了广阔的新路。

此外，幽默还可以作为塑造悲剧形象的一种辅助手段。如莎士比亚笔下的哈姆莱特，鲁迅笔下的阿Q，都是悲剧性很强的艺术典型。他们常常引起观众或读者无法自抑的笑声。这是一种含泪的笑声，这是一种悲剧喜唱、哀泪笑洒的艺术手法。使人在轻快时感受到沉重，在幽默里反衬出冷酷，在希望中预测到不幸，使观众、读者更加同情作者寄予深切同情的悲剧主人公。

幽默还有一种烘托气氛的艺术功用。例如，鲁迅《秋夜》的开头对枣树的运用，便以出人意外之笔一下子把读者带进了作品所需要的气氛之中，使人对下文产生强烈的好奇。这种烘托气氛的功能和刻划人物往往是密不可分的。

幽默，是文艺创作和美学研究的一个不可忽视的课题，加强对幽默艺术特点、规律的研究，无疑对繁荣社会主义创作是非常需要的。